

《附錄》

賭徒、鬼神與警察

——專訪胡台麗談「大家樂」

花逸文

（七十六年）七月十日，許多玩「大家樂」的人都不樂了！

當天刑事警察局在北、中、南三區同時進行威力取締，

共查獲二十起玩「大家樂」行爲，

起出賭資一百六十六萬多元，許多人並被移送法辦。

這是「大家樂」自風行以來，所受到的最大一次打擊。

然而，對於不同於一般賭博的「大家樂」行爲，

警方這種取締行動能夠奏效嗎？

本刊特別訪問了對「大家樂」做過實際田野調查研究的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胡台麗女士，請她對「大家樂」的發展作深入的剖析。

問：是不是可以先談談「大家樂」在台灣社會所以會如此畸型發展的原因？

答：台灣這二、三十年來變遷得非常快，從農業社會快速轉變到工業社會，人心不是那麼容易適應。一般人對這種變遷，顯得有點慌亂。對有些事情，看起來他們很激進，有時候，却顯得很懷舊、很保守。

而工業化的特質是人和人之間關係疏離，工作單調、生活平淡。因此他們會尋求一種刺激。

當然金錢的欲望是一直存在於玩「大家樂」這種行為之中，但「大家樂」却也給人一種共同參與創造了某一種事情的感覺。「大家樂」實在是反映了我們社會中某些大家所失落，又急需想要的東西。例如對人際關係的留念等等。

由於「大家樂」的不合法，因此更需要用一些非正式的形式來發展，非正式的形式又需要某種程度的互相信任、保密。如果是完全工業化的社會，這種網絡還不容易建立。可見在社會型態轉變的時候，大家對這種親密的人際關係，仍有某些程度的留戀。

「大家樂」基本上就是建立在這種由親朋好友組成的非正式的團體，除了金錢上互通有無之外，情感也獲得交流。

「大家樂」帶給這些人一些共同的話題，即使是多麼荒謬的話題，大家談起

來也是津津有味。

像外國人對於獎券這類東西也是很瘋狂，對於金錢的追求，是人性的共同弱點。但我認為，「大家樂」所以會發展成目前這種型態，和各種輿論的報導大多偏重於「大家樂」奇怪的、瘋狂的一面有關。

問：目前「大家樂」主要是附著在愛國獎券上面，這是表示一般人對愛國獎券，以及它背後所代表的政府公信力，是採取一種信任、或是不信任的態度？

答：這就牽涉到現在「大家樂」取締的基礎在那裡的問題了。大家始終最想不到的一點就是：為什麼政府可以做，而我們却不能作？他們會認為政府是最大的「組頭」，而且政府抽的利潤比「大家樂」的組頭抽得要高，這點是他們不能心服的地方。

問：但為什麼對愛國獎券不會那麼瘋狂迷呢？除了獎金的多寡之外，是不是還有原因？

答：愛國獎券本身所以不會產生像「大家樂」那麼狂熱的情緒，主要是因為愛國獎券的數字還是太多、太複雜了。「大家樂」在找一種很簡單的東西，例如說兩個數目字，可以很容易就滿足他們的需要。太複雜的東西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當然「大家樂」獲獎的機率和倍數，也是愛國獎券所不能比的。

問：除了「大家樂」之外，又出現了所謂「媽媽樂」，婦女也大量參與賭博行為，又代表了什麼意義呢？

答：就我所接觸到的婦女對象來說，她們大都認為參與「大家樂」對自己的家計沒有太大的妨害。有些人是自己賺了一點錢，有些人是在家用裡面省下一兩千塊來碰運氣，她們覺得可以控制自己。

問：在目前的「大家樂」遊戲規則裡，「組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組頭」被信任的基礎是依靠什麼建立起來的呢？你有沒有碰到被「組頭」倒掉的例子？

答：我覺得大部份的人都相信他們的「組頭」，如果不是信任感那麼強的話，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人去參加。通常這些作「組頭」的人，都是找親朋好友來參加，因此人際間的信任關係可以維持。

當然也有些「組頭」跑掉了，但在比例上並不是那麼高。而且事實上如果這些「組頭」的信用建立起來之後，每次的利潤都很高，並沒有必要跑掉。

我不曉得有多少人可以把「大家樂」拿來當作就業機會。但目前全台灣的組頭實在不少，這些人本身覺得她們是在做和拉保險一樣的工作，他們跑腿賺一點工錢也是應該的，這比愛國獎券抽四成合理多了。

問：在「大家樂」當中，神明扮演了一種微妙的角色，本來都是勸人為善的神，為什麼也被當成是求取非份之財的庇佑者，這種信仰轉變是怎樣發生的？

答：本來在台灣社會中，一些如「有應公」以及孤魂野鬼，本來是較為隱性的，但最近都顯著了起來。

可以說，在台灣目前這樣的社會中，現在除了道德、法律的規範外，還存在一個領域，它也不是完全非法、完全不道德，是介於道德和不道德之間的一個邊緣地帶，這個地帶在近幾十年來很蓬勃地在發展。

也許這些信仰是比較俚俗的，但也同樣有他們的邏輯思考存在。

就像台灣有十萬家地下工廠一樣，我們可以說這些地下工廠對環境等等的破壞都是事實，但却不能否認，這些地下工廠也解決了許多人的需要；「大家樂」的情形也是一樣。

台灣百姓很需要爭得自己的自由，希望出頭，不希望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安排的。這股力量很蓬勃。像黨外的運動也是如此，這些活動都偏重於在法律邊緣上的發展。

問：你認為群眾之所以想那麼急於掙脫出來，主要是不是整個社會制度、結構發生了問題，使得宗教信仰也發生了質變？

答：我想在原來的社會結構裡面，是有很多不合理的東西，因此人們的需求不能在這種結構下得到合理的滿足。從「大家樂」之中，我們可以看出許多盲目的反抗和追求，想去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

尤其是很多神壇的出現，在我訪問過的例子裡，他們很多本來是不想做猜「明牌」這些事的。但是他們的信徒都一直給他們壓力，好像他們如果不做的話，會失去信徒的向心力。而且他們做這個的利潤也很高，因此才會有那麼多的神壇出現。

我碰到過一個乩童，他也是被逼得不得不猜「明牌」，但是如果有幾期猜不中，信徒們就會來找他、要打他、威脅他，他也覺得很痛苦。有一次他就把所有的神明都請到門口，要神明和他一起懺悔。

問：這和我們以前對神的觀念好像有所不同，以前高高在上的神，現在怎麼變成平起平坐了？

答：基本上還是看他們找的是什麼鬼、什麼神。在信徒觀念中也沒有真正所謂的惡神、邪神，他們是找一些能包容他們的需求的神。他們也會認為「正神」會斥責他們這種想發橫財的心理，所以他們就去找那些比較不受道德規範的神，如有點瘋瘋顛顛的濟公和還是小孩子的太子爺。其他像孫悟空、豬八戒這些神也

是比較沒有道德感、常犯戒律的神；不是常會板起臉孔來的神，比較可以和他們「同樂」。

問：這其中不是有一個矛盾存在，為什麼這些人一方面因為不再那麼相信神的存在，而去追求金錢，但另外一方面又要他們已經不信任的神，保佑他們得到這些金錢？

答：我認為他們並不是對神放棄信仰，而是原有的神不能再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會在低階層的層次來尋找會幫助他們的神。

在這之中，當然有利用的味道在內，如果萬一不中，他們會認為是高階層的神在斥責他們，而低階層的神是在玩弄他們。對於這些低階神，他們就比較敢去發洩他們的憤怒，但是基本上他們還是相信這些神應該能夠幫助他的。

問：你覺得現在這種情形是信仰的崩潰，還是另一種信仰的再生呢？

答：我覺得這些現象顯示了一些傳統的信仰和道德，事實上都還在，但已經都不能滿足一般人的需要。這些需要壓過了他們對所謂正邪的判斷，而產生了一種曖昧不明的部分，愈來愈變成我們社會上的一種普遍現象。

他們的心理也一直很了解這不是很合法的事，因此他們去找的不是像媽祖那種正神，如果有一天他們去找「正神」的話，我想可能就意味著道德感的更加低

落。

問：傳播媒體的報導，是不是對參與「大家樂」的人有任何的影響？

答：一般來說他們不會受到報紙或是其他媒體的影響。後來警方拚命取締，輿論也在批評，但他們一直不聽，對他們而言，這種譴責的力量不是很強。

問：你認不認為警察取締會發生一些效果？

答：像平常也有人在打麻將，那種事情為什麼不去取締呢？有人認為「大家樂」只是消遣、娛樂，為什麼不能作呢？一般在認定上面就是抱著這樣的想法，我懷疑警察拚命取締會有什麼效果。這樣反而可能使一些不肖警察有勒索民眾的機會，這樣的結果反而使社會道德更加低落。

問：你對整個台灣社會有這麼多人參與「大家樂」的感想是什麼？

答：如果要批評的話，我覺得我們社會上的道德是蠻薄弱的。明明曉得有正神存在，會譴責他，但他還是要去追求那些不當的錢財。而且不但社會整個的批判力非常弱，自我約束的能力也很弱。

問：在這種道德約束力逐漸減弱的情形之下，是不是有什麼方法或許可以稍稍挽回？

答：民俗信仰的事情，事實上是會隨社會變遷的，因為我們的社會變遷太快，

但一些民俗思想仍然沒有改變，因此會產生這些現象。

我看到那些人迷「大家樂」的程度，真是覺得我們的教育需要檢討。這些人雖然最少都受過國民教育，但是他們在某些層面上却表現得學校教育似乎對他們一點影響力都沒有。許多人分不清楚神話和事實，有人真的相信有孫悟空，在這種時代還可能創造出這種信仰出來，真讓人對我們的教育發生懷疑。

更可怕的是，這種信仰會和科技結合起來，他們以為上了電視、報紙的東西都比較可信，因此科技的影響和以前對神的幻想就這樣地結合在一起。

舉例來說，我曾經問一個人在拜什麼，他說在拜帝爺公，我問他帝爺公是什麼神？他說：你沒有看電視嗎？前幾天才上過電視的啊！

再以濟公來說，前一段時間，幾家電視台都在演濟公，這些人就真的相信濟公真有其人，而且正在當道，因此就有人穿著電視上一模樣的服裝來扮演濟公。而他們做出的動作也和電視上的一模一樣。

從相對的角度來看，電視所以會一直演濟公的戲，也是因為社會上有些人正迷信濟公。在這種互相加強的情形之下，社會裡就出現了神話和事實完全混淆不清的現象。同時，再加上我們的教育也是非常神話化，含混不清，而且學校教育的價值標準和一般社會的價值標準又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才會造成這種情況。

問：那是不是我們要注重理性的教育，而不能只重道德性和感性的教育？
答：我想主要還是分辨的能力，我們的教育使得一般人只有情緒而沒有情感。

現在一般人的確沒有耐性去分辨、思考一些事，這些人一天到晚就要求「明牌」，但如果要他去思考道理，他就不願意了。

因此，現在的問題是，怎樣使參與「大家樂」的人能夠再思考，使他們看清楚他們自己在做什麼。

另外，媒體的報導或許也要改變一下，是不是要對「大家樂」背後所潛藏的台灣社會問題多加探討？是不是我們的民眾認為，政府管得太嚴、綁得太緊，而且政府本身言行也不合理，才會有這種瘋狂迷於一種非法賭博的行為表現出現？如果傳播媒體對這些問題不加以探討，而只是一味地加以撻伐，警察也不斷的取締，將來有可能會產生反效果。

問：照你的說法，是不是「大家樂」會變成一種類似瘟疫無法根除的東西？

答：我現在覺得只能讓它慢慢正常化。像現在「大家樂」狂熱的氣氛已經比較轉移到台北這邊來了，台中那邊的人會有機會反省。假如他們試過各種的神明、消息管道，都證明沒有什麼用之後，就不會再那麼狂熱，每期簽幾支的動機只是

捧捧朋友的場，這樣或許可以使「大家樂」慢慢沈寂下去。

問：你自己有沒有玩過「大家樂」？

答：有一次我去鄉下研究「大家樂」，有人問我來作什麼，我說是來研究「大家樂」的。他們聽了以後，就很高興的說：我們也在研究「大家樂」，說完就拿出一大堆籤詩來和我一起「研究」。

後來他們慫恿我去簽「大家樂」，我想爲了了解他們的心理，就決定也去簽一支。

決定了之後，就真的每天都在想要簽那一個號碼，日子確實改變了很多，每看到一樣東西，好像就變得有意義，好像那個東西可以給我一個數字。

後來我決定簽「十三」。在開獎的前一天，有人用車載我到一個墓地，去看乩童告示「明牌」。

我們車子到的時候，正好看到那個乩童拿著一根棒子在飛舞，他發現我們來了，就拿起棒子往我們車子的車牌上一打，這時所有的人都圍過來看，結果發現正好打在一和三之間，恰巧是我簽的那個號碼。當時一陣譁然，那幾個人本來簽別的號碼，都說要改和我簽一樣。

問：結果有沒有中？

答：沒有。

問：也許他是要告訴你，如果簽「十三」次就會中。

答：哈哈！

（轉載自「新新聞雜誌」，76、7、20—26）

《附錄》

冷靜觀察，熱情參與

吳錦發

——訪胡台麗談台灣社會觀察

胡台麗，父親是上海人，母親是江西人，她出生於台灣。紐約市立大學文化人類學博士，現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是國內年輕一代著名的人類學家，也是傑出的文學作家。近年她對台灣的老兵、原住民、大家樂等社會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並且常為文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廣受矚目；她的近作《性與死》，是前幾年隻身深入新幾內亞叢林，採訪原始土著民族的成果。

像這樣一位視野寬廣，對台灣滿懷摯愛的外省第二代，我素來甚為欽仰，另外，對她的文學創作如《媳婦入門》《吳鳳》等也頗為喜愛，所以五月四日我專誠北上訪問了她，以下是當天訪談的大要：

吳錦發（以下簡稱吳）：近些年，我常看妳發表的文章，發現妳一會兒發表有